

■ 时论与争鸣

DOI:10.15998/j.cnki.issn1673-8012.2023.05.010

文献计量技术应用于教育综述研究的 现象学反思



张 胜

(温州大学 教育学院, 温州 325035)

摘 要:文献计量技术已广泛应用于教育综述研究,相关反思则主要聚焦于技术本身及其应用。文章旨在进一步从现象学教育学视域审视文献计量技术应用于教育综述研究的局限。基于胡塞尔纯粹现象学关联域“自我—我思—所思”理论框架开展应然分析,同时以优质教育综述研究案例为实然对照,反思文献计量技术应用于教育综述研究在“提出研究问题”“进行专业遴选”“开展深度分析”3 个方面存在的不足,据此提出文献计量技术应用于教育综述研究的 3 点建议。第一,教育综述研究应在已有文献材料基础上,尝试回答更为综合的、根本的教育问题;教育综述研究伊始即表明对“教育生活世界”而非教育文献材料的核心关切,明确提出研究问题,并对其中包含的概念进行操作性界定。第二,基于研究问题确定兼顾代表性与全面性的文献检索标准,尽可能不遗漏“文字记号”不同但与“教育生活世界”符合的文献材料;针对检索所得文献材料,确定定性的文献纳入标准;针对纳入分析的文献材料,确定定量的质量评估标准。第三,秉持现象学态度悬置自身观感,将文献计量技术与内容分析法、主题分析法等相结合,基于“移情作用”实现对教育文献材料及其“教育生活世界”的“解释性理解”,深度分析教育文献材料的原初意义。

关键词:文献计量技术;现象学教育学;纯粹现象学;综述研究;教育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12(2023)05011711

致谢:本文的写作得到天津师范大学金美福教授的悉心指导。感谢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建议。论文初稿曾于 2022 年在第五届现象学教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得到诸多有价值的反馈,在此一并致谢。文责自负。

修回日期:20230508

基金项目:天津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学生数学学习元认知与非认知能力的增值评价与纵向干预研究”(2020YJSB102)

作者简介:张胜,男,回族,河北沧州人,温州大学教育学院特聘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论、数学教育研究。

引用格式:张胜.文献计量技术应用于教育综述研究的现象学反思[J].重庆高教研究,2023,11(5):117127.

Citation format:ZHANG Sheng. A phenomenological reflection on the application of bibliometrics in educational literature review study[J]. Chongqing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2023, 11(5): 117127.

一、问题提出

文献综述是贯穿整个研究过程的重要学术实践活动。基于不同的分类标准,文献综述被划分为不同类型。如有学者认为文献综述主要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学位论文的一部分,其余两类独立成篇,但又可基于研究方法的系统程度进一步划分为“系统性综述”与“非系统性综述”^{[1]3}。APA 出版物手册则依据综述对象及对应方法的不同,将期刊论文的文献综述分为叙述性文献综述(narrative literature review)、量化元分析(quantitative meta-analysis)和质性元分析(qualitative meta-analysis)3种^{[2]24-27}。

文献计量技术已广泛应用于教育综述研究。有教育研究者认为其“可以通过海量文献数据的自动分析,快速实现对某一研究主题的研究综述”^[3]。近来,部分教育研究者开始反思文献计量技术及其使用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颇具价值的建议^[4-6]。然而,相关反思主要聚焦于技术、工具本身存在的不足,以及研究者对技术、工具的使用不当。尽管这些讨论对纠正盲目使用文献计量技术开展综述研究的风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囿于技术层面,难以洞见文献计量技术的本质,无法从根本上指导教育综述研究中文献计量技术的合理运用。

为此,以胡塞尔纯粹现象学认识论观点为立论依据,结合实际案例,进一步反思当前文献计量技术应用于教育综述研究所存在的不足。案例选取综合考虑了学界认可度、来源权威性与国内教育综述研究现状。从当今国际重要会议、权威刊物的投稿要求来看,在国内外学界均获认可的综述研究是系统性综述研究。其中合理运用技术开展系统性综述的典型代表包括量化元分析和质性元分析。与国外相比,我国教育研究领域的元分析较少。不过,近年来国内教育研究中涌现出一些优质的量化元分析。质性元分析对质性研究文献材料进行系统性综述,也被称为“质性元综合”(qualitative meta-synthesis)。当前在国内,质性元分析尚未得到与量化元分析同等的重视,在数量和质量上均有极大的发展空间。有鉴于此,选取 PEERS^① 数据中心于 2021 年组织的一次名为“质性元综合方法简介:基于综合实现 STEM 公平与包容”的网络研讨工作坊为案例材料,作为文献计量技术应用于教育综述研究的参照对象。因篇幅所限,案例分析聚焦质性元综合的操作性内容,其定义、历史、适用性、价值等内容^[7](也可见 APA 出版物手册^{[2]27}及 APA 质性研究报告标准^{[8]91-101})不再赘述。本文中,综述研究主要指前述旨在独立成篇发表于学术期刊的文献综述性研究论文。

二、理论框架

胡塞尔采用笛卡儿的说法,以联词“自我—我思—所思”代表自我极(自我)、意向性行为(我思)、对象极(所思)及其关联统一^{[9]38-40},并提出“将所有研究问题初步整理在‘自我—我思—所思’这个标题下”^{[10]206}。据此,“自我—我思—所思”构成纯粹现象学关联域框架,“自我”“我思”“所思”则作为此框架的三个关联项。教育综述研究以教育文献材料为研究对象(意向性相关项)。而特定的教育文献材料之所以引起特定研究者的兴趣并成为其研究对象,是由于对特定研究者(自我)来

① PEERS 由美国教育研究协会(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AERA)与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下属大学间政治与社会研究联盟(Inter-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search, ICPSR)联合建立,旨在“扩大 STEM 教育研究合作关系(Partnership for Expanding Education Research in STEM, PEERS)”。

说,“不只是一般地存在着一个对象,而是这个自我作为自我注意地(也就是在思想中地、在积极设定中地),也就是在把握中地朝着对象”^①^{[11]5},即作为“自我极”的研究者秉持胡塞尔所言的“理论态度”^{[11]4}对作为“对象极”的教育文献材料具有特殊意义上的意向性行为。因此,纯粹现象学关联域框架“自我—我思—所思”可作为本研究的分析框架(如图1)。

对教育综述研究而言,“自我”即教育综述研究者主体,“所思”即作为综述对象的教育文献材料以及作为元对象的教育生活世界^②,“我思”即教育综述研究者主体朝向教育文献材料及其教育生活世界的意向性行为。“自我”“我思”“所思”两两相关联:“自我”与“所思”间由“兴趣方向”所关联,即特定的教育综述研究者主体会对特定教育文献材料(及其教育生活世界)感兴趣,特定的教育文献材料(及其教育生活世界)也会引起特定教育综述研究者主体的关注;“自我”与“我思”间由“问题意识”所关联,即特定的教育综述研究者主体会对特定教育问题产生个性化思考,特定的教育问题也会引发特定教育综述研究者主体的专属意识流;“我思”与“所思”间由“原创涌现”所关联,即对特定教育问题的原创性思考建基于特定教育文献材料(及其教育生活世界),特定的教育文献材料(及其教育生活世界)也会促进原创性意识流的涌现。由此,以下具体在胡塞尔纯粹现象学关联域内依据“自我”“我思”“所思”3个关联项及其关联性来反思文献计量技术应用于教育综述研究存在的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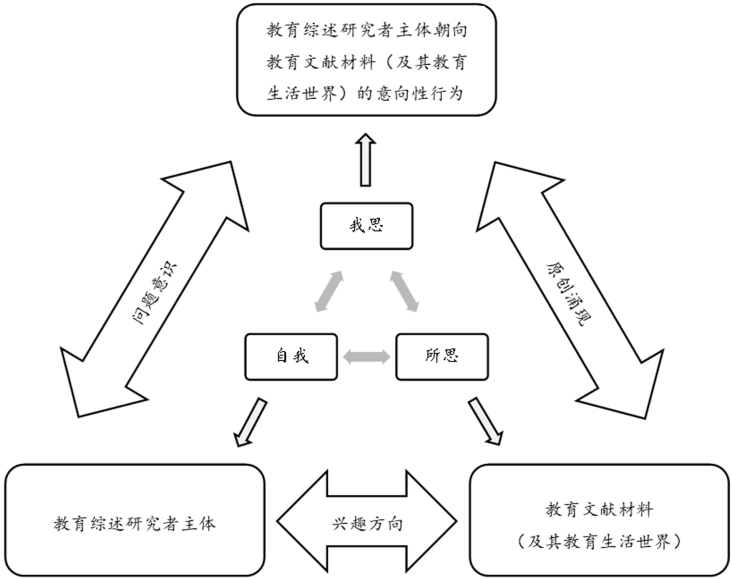


图1 理论框架分析图

三、依据“自我”关联项及其关联性的现象学反思

(一)教育综述研究之“自我”:研究问题意识关联的研究者主体

胡塞尔指出,“自我是在同一意识流内一切行为中的同一功能主体”^{[10]88}。所谓“我思故我在”,“我思”确证了“自我”的存在。因为只有“自我”才是一切“我思”的根本来源,“我思”无“我”,“思”不复存。“我,时时‘思想’的我,把‘我射线’朝向行为的对象。现在我们固定住自我,在自我中支配

① 本文在引用参考文献[10][11]时,没有呈现原文中的下划线;同时,对原文中的部分标点符号进行了不影响其原初意义的调整,如将“[]”调整为“()”。具体调整,烦请读者比对所引原文,下文不再逐一进行说明。
② 有关“作为元对象的教育生活世界”的内容,后文将基于胡塞尔的相关论述作分析,此处暂不展开。

的是‘我思想’本身,并纯粹如是地在那里支配着,因此自我作为‘我思故我在’(sum cogitans)而在绝对的无疑性中被给与。”^{[11]81}

对任何研究而言,最能彰显研究者主体(自我)地位的,都是专属于研究者“自我”的问题意识。因为只有来自“自我”的问题意识(我思)才能确证“自我”的存在,只有研究者“自我”才是这种具体化的独立思考与原创精神的根本来源。相较原始研究,研究者往往更难把握综述研究的问题意识。这是由于综述研究的性质决定了其原创性与原始研究的表现方式不同:综述研究的原创性着眼于对特定议题下相关但不相同的诸多原始研究的比较、解释,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概括、抽象,从而在发现局限、提出新的研究问题或假设、提炼新的理论概念或框架等方面做出并不逊色于原始研究的贡献。而文献计量技术显然只能帮助研究者勾勒出研究议题的大致现状,无法替研究者完成专业思考;只能将文献材料的基本信息进行简单综合,无法对之进行符合专业逻辑的抽象。

(二)文献计量技术应用于教育综述研究在“提出研究问题”方面存在不足

依据“自我”关联项及其关联性的现象学反思可知,文献计量技术应用于教育综述研究在提出研究问题方面存在不足。文献计量技术无法帮助研究者发现和提出具体的问题,只能概览较为宏观、宽泛的主题或议题。教育综述研究要回到认识的开端,回到其之所以发生的根源处——“自我”。指引教育综述研究始终的是研究者主体的问题意识——“自我”想要解决的教育问题是什么?通过综述研究能否解决该问题?怎样开展综述研究才能妥善地解决该问题?是这些在指引着教育综述研究的开展。正因如此,几乎所有综述研究学者都将“发现和提出问题”作为一项综述研究的起点^{[1]6-14 [12]12-40 [13-14]},APA 标准同样强调问题意识在综述研究中的首要地位^{[2]27 [15]161-163}。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强调研究问题的根源处在于“自我”,但并不认为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问题可单纯由“自我”而得。胡塞尔也强调:“另一方面,诸种刺激是指向自我极的,它们以或大或小的紧迫性吸引着自我,也许还促使自我转向它们,并引起一种真正的行动。”^{[10]207}事实上,综述研究问题往往并非一次成型,研究者(自我)提出的问题是在与研究对象(所思)的不断交互中,经由“我思”而逐步调整、明确和聚焦的^{[12]12-40 [16]1-16}。文献计量技术可在此交互过程中起到一定程度的辅助作用,但综述研究者要对研究问题的合法性来源有所意识,不可被其喧宾夺主。

(三)对照案例对“提出研究问题”的相关处理

在对照案例中,工作坊团队成员 Nuria Jaumot-Pascual 也一再强调,形成研究问题是检索前阶段的首要问题。“一个恰当的问题对元综合项目非常重要,因为它将帮助你决定文献检索和选择的标准,还将指导整个研究过程。一个可行的研究问题应是明确的,并且应指定元综合的范围。例如,什么因素会影响有色人种女性在本科工程教育中的毅力?”^[17]“我们将‘有色人种女性’定义为非裔美国人或黑人、亚裔或亚裔美国人、拉丁裔、西班牙裔或奇卡纳裔、原住民或太平洋岛民以及多种族或民族的女性。”该操作性定义确保研究问题被明确提出,并直接指引了综述研究的开展:“我们只关注有色人种女性的文献,故不涉及此问题的文献将不包括在内;我们专注于本科教育,故有关研究生院或工作场所的文献不会成为元综合的一部分;它还表明其与工程有关,故不可将讨论 STEM 的文献全部纳入其中。”这对文献计量技术应用于教育综述研究的启示是:向认识发生的根源处,即向研究者“自我”追问研究问题,并在形成和提出研究问题后,由研究问题指引其后的文献材料检索、获取等一系列工作。

四、依据“所思”关联项及其关联性的现象学反思

(一)教育综述研究之“所思”:研究兴趣方向关联的研究对象及元对象

教育综述研究以教育文献材料为研究对象。文献材料相对于“纯自然”而言,是一种“人工制品”^{[11]4}、“人为产物”^{[11]275}。作为“文字性表达物”,文献材料“具有其精神性”,“是心理物理统一体”,“有其物质面和精神面”^{[11]274-275}。胡塞尔突破主客观二元对立思维的分析表明,文献材料作为“具有一种相关于理解的精神意义、一种精神意涵的物”^{[11]200},其本质是一种“精神化的客体”^{[11]197}。教育文献材料作为教育学研究的“文字性表达物”,与自然科学研究文献材料更是有本质不同:自然科学研究“对于加于愉快、美丽、用途、实际适用性或完美性等标称下之事物的一切谓项,都完全不予考虑(价值、善、目的、工具、手段等等)”^{[11]4},而教育学研究则无疑蕴含着胡塞尔所言“评价的(广义上对美和善进行评价的)和实践的态度”^{[11]4}。故无论从“教育”抑或“文献材料”角度而言,教育综述研究对象的选取都应重视教育文献材料的精神意蕴,不可仅以文字记号等“物质显现者”^{[11]198}作为遴选依据,因为“文字记号不是本质性的”^{[11]199}。

那么,如何将反映教育文献材料本质性的精神意义纳入考量呢?此处依据胡塞尔提出的“元对象”概念进行分析:“显然,在所有这些形式的对象构成中我们返归于这样的对象,它不再指涉着那种最初产生于任何理论的、评价的、实践的自发性类型的前所与对象……它使相关的对象具有了完全真正的原初所与性,于是我们在一系列步骤中返回提供根基的对象或不再具有此回溯性意指的诺耶玛^①,后者是在最直接的设定中被原初地把握的或可被把握的,并不再指涉着任何先前存在的并首先应当被再活跃化的设定,此设定导致对象的构成性内容(bestand)。其特性包含现象学特征的对象,可以说是元对象,一切可能的对象均按现象学构成对其指涉,它正是意义对象。”^{[11]15}胡塞尔强调“生活世界”的原初意义,“首先是直接给予的生活世界,而且最初是像它作为‘通常的’在纯粹存在的确信中(因此是毫无疑问地)直接地完整地在这里存在着的世界而在知觉上给予的那样的生活世界”^{[10]208}。故对教育综述研究而言,要同时观照研究兴趣方向关联的研究对象(教育文献材料)和元对象(教育生活世界)。其中,源自教育生活世界的教育文献材料之精神意义真正彰显其本质性。因此,教育综述研究对研究对象教育文献材料的选取,要在元对象层面确保教育文献材料指涉的“教育生活世界”与教育综述研究者的核心关切保持逻辑一致性。毋庸置疑,文献计量技术在批量获取和存储文献基本信息、勾勒研究大致现状方面具有相当的价值。但文献计量技术无法帮助研究者朝向教育文献材料的元对象(教育生活世界),只能抽取“物质面”(文字记号),无法朝向教育文献材料的“精神面”,故其无法帮助研究者进行蕴含专业眼光的判断和选择。

(二)文献计量技术应用于教育综述研究在“进行专业遴选”方面存在不足

依据“所思”关联项及其关联性的现象学反思可知,文献计量技术应用于教育综述研究在进行专业遴选方面存在不足,具体表现在相关性、严谨性、完整性3个方面。首先,在相关性方面,文献计量技术选取教育文献材料主要是经由检索词获取相应的文献基本信息等数据。但此举本质上是“文字记号”操作:只能检索其“名”,无法检索其“实”。而教育研究中堪称胡塞尔所言“在主体间层次上可交换的概念”^{[11]346}者寥寥无几,“名”相同而“实”大不同的例子却不胜枚举。此外,检索词的抽象程度也会对文献检索结果有重要影响,但其却经常会被文献检索者有意无意地忽视^{[12]21}。

其次,在严谨性方面,许多运用文献计量技术开展的教育综述研究对所获取的教育文献材料不做

① 即“Noema”,李幼蒸在《胡塞尔著作集》中将其译为“诺耶玛、意向对象”^{[11]412},莫兰和科恩在《胡塞尔词典》中称胡塞尔往往将其与“我思对象、被思对象(cogitatum)”互用^{[9]39}。

任何质量评估即进行分析,而不经任何评估即保留下来的文献材料未必均有分析价值。再者,即便进行评估,文献计量技术也只能依靠 SSCI、CSSCI 索引等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外在评价进行“一刀切”式的判断,无法代替研究者依据研究设计、论证逻辑、证据充分性等进行专业判断。事实上,只有在研究者专业眼光的审视下,文献材料的严谨性才能得到保障。完全依靠文献计量技术与索引目录,很有可能将存在错误的文献材料纳入分析,进而影响综述研究的质量。

最后,在完整性方面,基于文献计量技术所得的教育研究文献材料,上限不过是其技术功能范围内可获取、分析的文献。文献计量技术只能应用于符合特定模式的文献材料,而已有教育研究文献材料自身的模式并不会因文献计量技术的发展而发生改变。例如,文献计量技术和工具只能处理特定文献平台上符合特定模式的期刊文章、学位论文,无法将特定文献平台上未存储的专著、研究报告等文献材料纳入分析。倘若因运用文献计量技术而系统性缺失了研究方向上的文献材料,则有以偏概全的隐忧。故研究者需严格考量任何可能因文献计量技术而被排除在外的相关研究,并有义务在综述研究中进行有关完整性限度的适当声明。

(三)对照案例对“进行专业遴选”的相关处理

对照案例首先在元对象层面规定了其“教育生活世界”。工作坊团队负责人 Maria Ong 在工作坊伊始就表明了团队对教育实践的核心关切。她介绍,本次工作坊的主讲人是 4 位少数族裔女性研究者。从团队“周围世界”出发,她们关心的议题是:在高等教育中,有色人种女性在科学、技术、工程或数学(STEM)道路上以何种方式得到支持或遭受阻碍?同时她声明这些研究均在美国开展,提供了研究所面对的教育实践情境。作为少数族裔女性研究者,研究团队对有色人种女性有深切的人文关怀。与此同时,在美国的教育实践情境中,有色人种女性确实由于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在有关 STEM 的高等教育中面临更多困境,需要得到更多支持。结合前述研究问题“什么因素会影响有色人种女性在本科工程教育中的毅力”,可以看到,教育综述研究问题来自教育综述研究者的“教育生活世界”,是教育综述研究者对教育实践关切的细化和聚焦。

其次,对照案例在研究对象层面于文献检索前确定了文献检索、选择和质量评估标准。第一,针对相关性问题的,研究者确定了文献检索标准。Nuria Jaumot-Pascual 指出,“需要考虑搜索引擎的工作方式以及搜索词和日期,以获得你感兴趣的最具包容性又最具针对性的结果。检索标准有助于搜索词的选择,而这会帮助你识别元综合保留和排除的文献”。从实操层面来说,研究者需重点考虑人口、主题、方法、地理位置等^{[8][94][15]163}。案例主要考虑了人口(有色人种女性)、背景类型(本科教育)、学科领域(工程)和出版年份。除此之外,Nuria Jaumot-Pascual 重点强调了搜索引擎的重要性,“开始检索前,测试数量相对较多且不同类型的搜索引擎以评估哪些搜索引擎可以为研究提供最多的相关检索,这一点非常重要”。在案例中,研究者测试了 16 个搜索引擎并最终使用了其中的 7 个。当然,不可忽略搜索过程中对布尔运算符的运用^{[7][16]22}。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第二,针对严谨性问题,研究者确定了文献质量评估标准。为确保产出高质量元综合,有必要确定一组有关已有研究纳入最低接受度的标准。这些标准通常与研究中使用的方法和证据的清晰度、一致性有关,例如研究是否包括研究问题和方法,以及是否包含足够的证据来支持研究结果。当然,文献质量评估标准也与研究问题及研究领域在当前已有的研究质量有一定关系,文献质量评估标准并非越高越好,过低或过高的标准对综述研究均不利。总的原则是:采用能与研究现状相匹配的文献质量评估标准,确保其对当前综述研究的开展有意义。

第三,针对完整性问题,研究者进一步确定了文献选择标准。文献选择标准与文献检索标准有所

不同,其适用对象为通过检索标准后得到的文献。Nuria Jaumot-Pascual 如此说明工作坊案例中的文献选择标准,“在我们使用的示例中,团队决定将所有实证研究纳入其中,无论其是否发表在书籍、报告、同行评审期刊、学位论文或其他地方。在某些情况下,出于质量或方便的目的,可能会决定仅选择经过同行评审的文章”。

进入文献检索与选择阶段后,研究者首先利用前述文献检索和选择标准对已有文献材料进行初筛。在该阶段,研究者可基于对摘要的判断来完成筛选。Nuria Jaumot-Pascual 提醒听众,“因为此时获得的信息非常有限,所以标准的应用应较为宽松,否则可能会误删符合条件的研究。在后续应用标准时则可更严格”。第二次筛选则是对初筛后保留的文献作更仔细的检查,更严格地应用文献检索和选择标准。“此时需获得文献资料全文,以便通过阅读获得必要的细节。保留的文献将进入质量评估步骤。”Nuria Jaumot-Pascual 认为,文献质量评估标准通常涉及对已有文献材料作“研究设计”“研究问题”“情境描述”“研究对象描述”“理论框架”“局限”“证据充分性”“数据收集方法的描述”“数据分析方法的描述”等方面的评估,视综述研究的不同情况,研究者选用不同的指标,赋予不同的权重。得以通过此次文献质量评估的文献,组成综述研究的文献初始集。

在建立文献初始集后,基于文献索引技术的辅助,研究者利用向前滚雪球法和向后滚雪球法对文献进行二次收集。所谓“向前滚雪球法”,是指在文献搜索引擎和检索平台上,利用“引证文献”(cited by)功能,搜索所有引用了初始集中文献的研究文献(向前推进)。与此相对应,“向后滚雪球法”则指利用参考文献列表,搜索所有初始集中文献所引用的研究文献(向后追溯)。理想的滚雪球法是多轮持续滚动直到没有新的文献材料被发现。工作坊团队成员 Christina B. Silva 建议,“要确定文献收集是否已达到饱和点,可能需要联系元综合中所包含文献的作者,看看他们是否对纳入其他出版物有建议”。但 Christina B. Silva 也同时指出,“滚雪球法要考虑到实用性和预算”。对利用滚雪球法收集到的文献,再次进行前述两次筛选及质量评估,得以保留的文献与初始集合并,即得到综述研究分析所需的文献最终集。

五、依据“我思”关联项及其关联性的现象学反思

(一)教育综述研究之“我思”:研究者主体朝向研究对象及元对象的意向性行为

“我思”关联了自我极(自我)与对象极(所思),并使三者共同成为统一体。胡塞尔指出,“我思显然本质上属于主体和主题性客体之间的意向性关系,此我思规定着主体性客体(为我的客体,为此自我的客体)或规定着此主题性关系:在此关系中,客体显现,被知觉,被记忆,被空地再现,被用概念来思考,如此等等”^{[11]182}。就教育综述研究而言,“我思”即为教育综述研究者主体朝向教育文献材料(研究对象)及“教育生活世界”(元对象)的意向性行为。教育文献材料并非“纯自然”意义上的“物质物”,而是以精神意义为本质的“理解性统一体”^{[11]197},探寻其精神意义必须返回其“教育生活世界”。显而易见的是,完全依靠文献计量技术开展教育综述研究,仅仅抽取了来自研究对象的抽象文献基本信息并对之进行分析,而对教育文献材料的“精神面”及元对象——教育生活世界所赋予的原初意义等关键内容缺乏必要的深度分析。

(二)文献计量技术应用于教育综述研究在“开展深度分析”方面存在不足

依据“我思”关联项及其关联性的现象学反思可知,文献计量技术应用于教育综述研究在开展深度分析方面存在不足,具体表现在两方面:其一,对研究对象(教育文献材料)的“精神面”分析有所欠缺,未充分把握其精神意义;其二,对元对象(教育生活世界)缺乏足够的观照,致使对研究对象精神

意义的理解存在偏差或不够深刻。

首先是对教育文献材料的深度分析不足。文献计量技术对教育文献材料的分析本质上是对胡塞尔所谓“文字记号”^{[11]199}、“书写符号”^{[11]204}、“词语符号”^{[11]274}等“物质面”的分析。一来,此种分析仅在上述记号、符号成为胡塞尔所称“在主体间层次上可交换的概念”^{[11]346}的前提下才具意义。但如前所言,在教育学研究中并不“不具有一种绝对固定的概念性,而只是‘描绘性’表达”^{[11]329}。二来,即便满足该前提,此意义也并未触及“精神面”。因为就探寻精神意义的路径而言,“作为在严格意义上追求‘精确性’的科学则要求着一种方法学,后者在概念性本质的绝对同一性中规定着和固定着通过真正本质概念所直观者”^{[11]329},最终达成“直观的理解”^{[11]337}。依据胡塞尔的观点,对作为“精神化客体”的教育文献材料进行“数学自然化”^{[11]311}的计量分析不具本质性意义及合法性。

其次是对“教育生活世界”的深度分析不足。依据胡塞尔的划分,教育学当属精神科学,“在此科学内包含着一切人的观察和人的知识,关于人格、社会性的研究,以及关于人格的周围世界之形成和改造的研究——一个科学综合体,我们将其归总在精神科学的标称之下”^{[11]305},“然而在精神的态度中我们的专一主题就是主体及其周围世界”^{[11]305}。赋予教育文献材料以原初意义的是教育原始研究者所朝向的“教育生活世界”,故对教育文献材料开展深度分析必须观照作为元对象的教育原始研究者的“教育生活世界”。教育综述研究者需基于胡塞尔多次强调的“移情作用”^{[11]155,204,333}将教育原始研究者视作“同伴”^{[11]162,282},以实现对其理解。这种“理解”被胡塞尔称为“解释性理解”^①。对于如何达成“解释性理解”,胡塞尔也曾给出观点:“我模仿体验着他人的精神生活,因此体验着他人的精神世界、他人的精神客体,并按其个别的意义或精神的意义对其理解。”^{[11]249}

综上可知,教育综述研究不应忘却对教育原始研究者所朝向的“教育生活世界”的探寻。这种探寻,要求教育综述研究者深入分析研究对象的“精神面”及元对象,而非仅借文献计量技术之力浅层分析研究对象的“物质面”。教育综述研究者需秉持技术为我所用而非技术主导的态度,深入了解教育原始研究者的“教育生活世界”,进而基于“自我”的分析和判断来创生“我思”。

(三)对照案例对“开展深度分析”的相关处理

在开展深度分析方面,对照案例并未停留于对研究对象“物质面”的计量分析,而是基于包括编码、主题分析、发现、讨论4个迭代循环步骤的深入分析,触及研究对象“精神面”及元对象——纳入分析教育原始研究相关的“教育生活世界”。限于篇幅,本文着重分析最具代表性的编码环节,其他步骤不再呈现。在编码环节,工作坊团队成员 Lisette Torres-Gerald 主要介绍了3种编码方法:演绎编码、归纳编码和混合编码。其中,“演绎编码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方法,基于该方法,可依据特定的理论框架、已有研究结论等使用预先确定的编码……归纳编码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方法,可通过该方法开发编码……混合编码即同时使用归纳和演绎编码的方法,它是数据驱动与理论驱动编码的组合。它还意味着修改现有编码、归纳创建子编码,以包含理论驱动编码中未包含在其初始定义中的新元素”。基于胡塞尔纯粹现象学观点来审视,演绎编码的本质为教育研究共同体就现有教育研究相关“教育生活世界”展现出的某些侧面达成的共识。归纳编码则是发现教育综述研究中纳入分析的教育原始研究相关“教育生活世界”所展现出的新侧面。混合编码不但是二者的结合,同时还会基于“教育生活世界”展现出的新侧面修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此外,Lisette Torres-Gerald 建议团队研究开发编码

① 援引李幼蒸在《胡塞尔著作集》第3卷的中译者注:“nachverstehenden,胡塞尔特用语,含反思性、交流性、再造性理解之意,实即移情作用中的理解。也即对他人的理解性体验中,对他人之体验的理解中。”^{[11]225}

手册,以帮助团队成员及时达成共识,避免编码偏差。基于胡塞尔纯粹现象学观点来审视,此举的重要性在于避免因团队成员自身“周围世界”的不同,而对纳入分析的教育原始研究相关“教育生活世界”的理解产生较大偏差。

六、结 语

本文基于胡塞尔纯粹现象学关联域“自我—我思—所思”框架,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反思了文献计量技术应用于教育综述研究在“提出研究问题”“进行专业遴选”“开展深度分析”三方面存在的不足。通过优质教育综述研究案例的对照,表明当前基于文献计量技术开展的教育综述研究在此三方面尚有提升空间。基于此,结合对开展系统性综述研究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标志性文献^[18-19],提出文献计量技术应用于教育综述研究的三点建议。

第一,教育综述研究问题的根本来源是研究者主体,一个好的、有价值的教育综述研究问题必然也必须朝向“教育生活世界”,不能停留于从文献到文献的书斋式映射。因此,研究者应在教育综述研究伊始表明其对“教育生活世界”而非教育文献材料的核心关切,并明确提出研究问题。与此同时,对研究问题中所包含的概念进行操作性定义时,避免因“文字记号”而对“教育生活世界”的理解产生偏差。例如,近期有系统性综述表明,相同的文字记号“校园欺凌”(school bullying)就指向不同的“教育生活世界”^[20]。特别是,教育综述研究应在已有教育文献材料的基础上,尝试去回答更为综合、更为根本的教育问题。而前文分析表明,文献计量技术只可胜任简单的文献综合工作。因此,教育综述研究者应考虑到文献计量技术的功能限度,主要借助其回答描述性问题(如历史发展脉络、研究热点等)^①,或将其与内容分析法、主题分析法等相结合,用以回答更具深度的教育研究问题。

第二,教育综述研究对教育文献材料的遴选不能只依靠技术,更要依靠研究者的专业眼光和判断。具体而言,研究者可依据研究问题确定文献检索、纳入和质量评估标准,进而基于相应标准对教育文献材料进行专业遴选。首先,基于研究者所关切的“教育生活世界”,依所提出的研究问题确定文献检索标准。该标准的确定需把握好代表性和全面性之间的张力,目的在于获得最具包容性而又最具针对性的检索结果,尽可能不遗漏“文字记号”不同但“教育生活世界”符合综述研究主题的教育文献材料。特别要注意的一点是发表偏好对综述研究结果可靠性造成的影响,尽可能多地关注包括未公开发表的报告、学位论文等灰色文献^[21]在内的多种文献材料。在实际操作中,可基于对多个数据库和搜索引擎的测试逐步确定最切合具体研究问题的标准,同时辅以前、向后滚雪球法,囊括尽可能多的切题文献。此外,对布尔运算符的运用可优先考虑“在主体间层次上可交换的概念”^{[11]346},如性别、学段、地域、学科、发表时间段等,尽可能做到公认无异议。其次,针对检索得到的教育文献材料,确定文献纳入标准。文献纳入标准是从定性角度判断文献是否应被纳入分析。该标准也需视具体研究问题而定,不可一概而论。最后,针对纳入分析的教育文献材料,确定质量评估标准。该标准通常基于专业眼光从研究设计、研究方法、数据质量、结果可信度等方面对文献进行全方位的评估,而非仅依靠受多种因素影响的索引目录。质量评估标准是从定量角度对文献的参考价值进行刻画,研究者可根据此赋予不同文献以相应的权重,进一步提升综述结果的准确性。

第三,教育综述研究不能停留于技术带来的浅表分析,只有研究者对教育文献材料及其“教育生

①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描述性问题通常不涉及深入分析,但这并不代表描述性问题不重要,很多描述性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义。

活世界”进行深入分析,才能发现其原初意义,真正实现教育综述研究的应然价值。为达成此种深度分析,教育综述研究者需秉持现象学态度悬置自身观感,基于“移情作用”实现对教育文献材料及其“教育生活世界”的“解释性理解”。就具体方法而言,除了已有研究提及的内容分析法^[6],还应重点关注主题分析法。主题分析法也被称为质性内容分析法^[22],注重理解文本内容的实质意义,极为契合透过“文字记号”理解“教育生活世界”的现象学教育学思想。主题分析法不但适用于对质性数据或质性文献材料的分析,而且对其他类型教育文献材料的分析有重要借鉴意义;对理论思辨研究文献材料的分析无疑需要理解遣词用句背后的丰富意涵,即便是对量化研究文献材料的分析,也需深入考察对同一概念的实质测量是否相同?抑或对不同概念的操作化本质上是否无差异?前文提及的“校园欺凌”即是实例^[20]。

参考文献:

[1] GREETHAM B. How to write your literature review[M]. London, England: Red Globe Press,2021.

[2]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M]. Washington,DC: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2020.

[3] 蔡建东,汪基德,马婧.教育理论研究的量化与技术化路径:科学计量学方法与技术在教育理论研究中的应用[J].教育研究,2013,34(6):1723.

[4] 柯文涛.工具的祛魅:CiteSpace在教育研究中的应用与反思[J].重庆高教研究,2019,7(5):117128.

[5] 马小燕.基础教育文献计量研究的问题与反思[J].中国教育学刊,2021(3):4549.

[6] 殷佳敏.计量可视化方法在教育研究中的应用与反思:以近10年《礼记·学记》研究为例[J].上海教育科研,2023(1):2630.

[7] ONG M, JAUMOT-PASCUAL N, TORRES-GERALD L, et al. Introduction to qualitative meta-synthesis methods: achieving STEM equity and inclusion through syntheses [EB/OL]. (2021-05-20) [2023-05-08]. <https://www.icpsr.umich.edu/web/pages/peersdatahub/prof-dev.html>.

[8] LEVITT H M. Report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psychology: how to meet APA style journal article reporting standards [M]. 2nd ed.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2020.

[9] 莫兰,科恩.胡塞尔词典[M].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10]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M].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11] 胡塞尔.现象学的构成研究——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2卷[M].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12] 库珀.如何做综述性研究[M].刘洋,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

[13] COOPER H. Hypotheses and problems in research synthesis[M]//COOPER H, HEDGES L V, VALENTINE J C. The handbook of research synthesis and meta-analysis. 3rd ed. NY: Russell Sage Foundation,2019: 2035.

[14] PETTICREW M, ROBERTS H. Systematic review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 practical guide[M]. Oxford, England: Blackwell Publishing,2006:2756.

[15] COOPER H. Reporting quantitative research in psychology: how to meet APA style journal article reporting standards [M]. 2nd ed.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2020.

[16] 马奇,麦克伊沃.怎样做文献综述:六步走向成功[M].陈静,肖思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

[17] ONG M, JAUMOT-PASCUAL N, KO L T. Research literature on women of color in undergraduate engineering education: a systematic thematic synthesis[J]. Journal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2020,109(3):584615.

[18] SIDDAWAY A, WOOD A, HEDGES L. How to do a systematic review: a best practice guide for conducting and reporting narrative reviews, meta-analyses, and meta-syntheses[J].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2019,70(1):747770.

[19] MOHER D, LIBERATI A, TETZLAFF J, et al. Preferred reporting items for systematic reviews and meta-analyses: the PRISMA statement[J/OL]. (20090721) [20230507].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med.1000097>.

[20] XIE Z, MAN W, LIU C, et al. A PRISMA-based systematic review of measurements for school bullying[J/OL]. (20220826) [20230508]. <https://doi.org/10.1007/s40894022001945>.

[21] GIUSTINI D. Retrieving grey literature, information, and data in the digital age[M]//COOPER H, HEDGES L V, VALENTINE J C. The handbook of research synthesis and meta-analysis. 3rd ed. NY: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19: 104-126.

[22] KUCKARTZ U. Qualitative text analysis: a systematic approach[M]//KAISER G, PRESMEG N. Compendium for early career researchers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 Cham, Switzerland: Springer, 2019: 18-197.

(编辑:刘大川 校对:王茂建)

A Phenomenological Reflection on the Application of Bibliometrics in Educational Literature Review Study

ZHANG Sheng

(College of Education,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325035, China)

Abstract: Bibliometrics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educational literature review study. Relevant reflections mainly focus on the technology itself and its application.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further examine the limitations of bibliometrics applied to educational literature review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enomenological pedagogy. Based on normative analysis through Husserl’s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ego-cogito-cogitatum” in the connexion of pure phenomenology, and taking the case of high-quality educational review study as a practical contrast, the reflection confirmed that it has shortcomings in “raising research questions”, “conducting professional selection” and “conducting in-depth analysis”. Based on this, three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Firstly, educational literature review study should attempt to answer more comprehensive and fundamental educational questions based on existing literature. At the beginning of educational literature review study, researchers should express their core concerns about the “educational life world” rather than educational literature, clearly propose research questions, and operationally defined the concepts contained within research questions. Secondly, based on research questions, literature retrieval standards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balance representativeness and comprehensiveness, striving to avoid missing literature that have different “textual notations” but are relevant to the “educational life world” as much as possible; the qualitative inclusion criteria should be set for literature obtained through retrieval, the quantitative quality evaluation standards to be set for the literature included in the analysis. Thirdly, researchers should hold a phenomenology attitude to suspend their own perceptions, combining bibliometrics with content analysis, thematic analysis, etc., achieving “interpretative understanding” of educational literature and its “educational life world” based on “empathy”, and deeply analyzing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educational literature.

Key words: bibliometrics; phenomenological pedagogy; pure phenomenology; literature review study; educational research